

冉冉上升的朝阳文学 ——漫谈科学幻想小说的魅力

达世新

1969 年,人类的双脚首次迈上了月球。然而在差不多 100 年前,法国人儒勒·凡尔纳就在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环绕月球》中,展示了登月飞行的壮举。他的描述同实际进行的过程竟有多处完全一致:登月飞行由三个人来完成,发射场设在佛罗里达,回归舱软着陆在太平洋里,并由军舰打捞上来。诸如此类的颇为准确的预测例子在中外科幻小说中不胜枚举,如雨果·根斯巴克的《拉尔法 124c41+》之于阳光电站,卡雷尔·恰佩克的《炸药》之于原子武器,肖建亨《钓鱼爱好者的唱片》之于音响捕鱼……

这样的情形在文学创作中无疑是别开生面的,它犹如一扇可以窥视未来的魔窗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值得重视的是,它时常也会对于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发明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是直接的提示。如英国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在《太阳帆船》中叙写了一场在外层空间举行的奇特的帆船竞赛,巨帆利用的是来自太阳的辐射压力。小说发表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就对利用“太阳风”的可行性着手进行研究,目前已在有些领域开始了实际利用。难怪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在其自传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凡尔纳是我一生的总舵手。”前苏联发明家杰尼修克也说:“正是叶弗列莫夫的《往事的影子》激发了我

研究全息摄影的理想,尽管最初看来在技术上实现它几乎是毫无希望的。”

如果我们设法探究隐蔽在这些现象后面的原因,那有一点显然是最为主要的:文学跃动着自由的想象、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回响着心灵的呼唤,科学则立足于严密的逻辑推导、扎实的实验论证,而科幻小说奇妙地在这两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一系列的交融、比较、碰撞中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即使被后来的科学发展证明是幻想错了的科幻作品,仍不失其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同样产生着类似的作用。

当代一些优秀的科幻作家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很注意将文学和科学在新的层面上的结合,“将读者尚未知道或难以接受的知识,点点滴滴,或明言或暗示地传达给读者”。美国科幻泰斗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台球之谜》就是这样的一篇杰作。作品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在对两位科学家独特而有力度的性格描绘中,记录了一次零重力机的试验,试验是在这台新机器下的台球桌上进行。至于零重力机深奥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作者用几句比喻性阐释便带过了,最后台球在球棍的一击下,竟然出人意料地背离了该机制造者所宣称的情形,而是以光的速度穿透了他自己的胸膛,又遁入茫茫太空继续运行。读罢这篇小说,人们会掩卷难忘,回味无穷。这样的科幻作品会影响到读者的意识深层,促使人们的思维突

破传统模式的束缚,闯出心理定势的死角。

由上所述,我们便不难理解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见到邓小平等我国领导人时,何以要多次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并说“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

二

幻想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社会,独自逍遥于科学王国之中。恰恰相反,科幻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表现社会、思考人生方面树立了一位“特别探索者”的形象。

1818年,英国大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弗兰肯斯坦》,作品通过青年学者弗兰肯斯坦利用从解剖室和尸体所盗来人体材料造出怪人,招致一连串灾难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引发人们对于科学研究负面效应的深长思考。

科幻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流派的确立得益于儒勒·凡尔纳和乔治·威尔斯的杰出贡献。凡尔纳被誉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一生创作了50多部科幻小说。尽管他的作品是以“硬科幻”著称于世,以知识性和科学预见性见长,但同样也不乏社会意义,尤其是在他创作的后期,如在他60岁时完成的《被推翻的世界》一书中,数学家马斯东等几个天才人物为了开采极地煤矿以获取暴利,试图利用最新技术改变地轴的方向,进而融化北极之冰,他们毫不顾忌这样做对于一些临海国家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这部小说给读者带来了很有意味的联想,直至今天读来还颇有现实意义,我们会马上想到南极这块地球上最后的未被污染未经战争,又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海洋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白色大陆,它如今不是正处在有些国家和集团企图凭实力瓜分、掠夺式开采等种种潜在的威胁之中吗?

乔治·威尔斯则在继承狄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总结前辈幻想

作家斯威夫特等人的创作经验基础上,全面发展了科学幻想小说。他的《时间旅行机》、《隐身人》、《莫若博士岛》等7部享有盛名的科幻小说,无一不是既表现了科学的神奇力量,又敏锐地表现了科学发展对于社会的深刻影响,曲折而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在他的手中,科幻小说的社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健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幻小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发展,有成就的科幻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不仅出现在法国、英国,也出现在美国,出现在苏联、捷克、日本,如约翰·坎贝尔的《火星上的智能》、亚·别里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脑》、卡雷尔·恰佩克的《鲑鱼战争》、泮野十三的《地球盗难》。我国的科幻小说创作也于这一时期开始了起步,顾均正在1939年发表了《和平的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幻小说在美国迎来了作品数量激增、艺术流派纷呈的“黄金时代”,像罗伯特·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等当代科幻名家都是在这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这些作家以非凡的敏锐和笔力提高了科幻文学思想品位,涉及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和人的造物机器人的关系”等诸多重大命题。之后,科幻小说又经历了“新浪潮”运动的洗礼,这一运动注重从另一个方向开拓前进,正如“新浪潮”主将、英国著名科幻作家J·G·巴拉德所声明的:“与其向太阳系和银河系去旅行,不如探求人的意识的宇宙。”“内宇宙”概念的提出为科幻小说深入表现科学社会中人性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认识工具。

纵观这些阶段以及如今的优秀科幻小说,我们将会十分有趣地发现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的现象:一方面幻想愈来愈光怪陆离,一方面又与社会的联系愈来愈广泛和深入。真与假、实与虚、短暂与永恒、清晰与模糊、感觉与理性绝妙地熔于一炉,浇铸成一块胜似一块的多棱镜。如当代美国科幻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詹姆斯·布利什在《盒子》中别出心裁地描述了纽约被一个巨大的黑色碗状物倒扣住,氧

气逐渐转变成一种不能呼吸的东西,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惊恐和混乱中。科学家和军队将领们尝试用各种先进手段力图打破这个盒子,并竭力从各自不同角度探查这个盒子的发生源。故事似乎荒诞无稽,但它无疑是在暗示现代工业的畸形发展已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一系列潜在的威胁,科学技术正变成一股“异己”的力量,作品深切地传达了作者对于人类命运的担忧。

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透现出近些年来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态势,那就是把获取“触手”积极伸向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神文化领域,并注意融和主流文学的一些现代艺术手法,这使得它像一个诸兵种合成的军团,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三

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作为一种与科学相结合的新型文学样式的科幻小说,它以新的表现力、新的审美观拓展出人物塑造的崭新空间。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科幻,故事发生在1886~1888年这3年间,主人公尼摩船长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后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冒险家形象,他勇敢地支持被压迫者的反抗,尝试用潜水船“鹦鹉螺”号在海洋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认为“地球上所需要的不是新的大陆,而是新的人!”作者在刻划这一形象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方法上,而是充分运用了他丰富的海洋知识,来照亮笔下人物的生活环境,并渗透进人物的思想脉络、经历与行为之中。尼摩船长这位新人形象跻身于19世纪许多光彩照人的文学人物长廊里,并设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起来,他始终强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视线。因为他符合这样一条审美真谛:科学愈是与艺术紧密结合,就愈是具有美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科幻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方面,有时并不比主流文学逊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的科幻作家们曾在这方面作过着力的开掘,如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金涛的《月光鸟》、魏雅华的《“飞毯”的风波》等都是具有相当影响的成功之作。其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人物形象有深度地植根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和现实斗争之中,得到了生活“活水”的滋润,人物刻划克服了我国以往科幻小说普遍存在的单一、平浅的固疾,进入了性格化,从而使我国的科幻小说创作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过,应该说,这类作品并不会成为科幻小说的中坚。我非常赞同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卡尔·萨根的新言:“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科幻小说的最大意义,莫过于它对未来的试验,对各种可能目标的探索,和使未来的冲突减至最少。”写到这里,很自然地要提起日本首屈一指的科幻作家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和美国科幻作家寇兹威克饮誉全球的《外星人》。前者写了某一天日本列岛因地层变动突然面临了沉没危险;后者则写了一艘外星飞船(他们的文明远比我们先进)闯入了地球,一名掉队的外星人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恐慌。两位作家展示了来自地球内外两个不同方向的挑战,但都在如何应付这种挑战中让其主人公大放异彩。田所博士、内阁总理、小野寺等人为了拯救日本民族,历经种种难以想见的艰难组织起一场国际大疏散,男孩伊力和女孩裘蒂则干扰了政府当局的搜索行动,奇妙地与外星人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和信任,并设法把它送上了归程。在感人至深的描述中,浓郁的超前意识成了人物的底蕴。

这类形象目前还都属于“隐藏在进步的地平线下面的人物”(德米特里·比伦琴语),但科幻小说这架神奇的望远镜已使我们提早地发现了他们,他们将引导我们更好地走进未来。

四

科幻小说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而

诞生,在当代科学和当代文学的交互影响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现代艺术,它对于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很好的适应性。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现代读者已不仅是作品的被输入对象,他们变得更有主见,在意识和潜意识中要求参与创作,希望作品能给他们留下思考、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换句话说,作品应给人们带来“空柜效应”。

科幻小说作为由已知世界出发,对未知世界或未知领域所进行的一种推理,一种假说,自然会遇到读者的质疑、丰富、甚至是重新推理。这种“空柜效应”所牵涉到的时间和空间的规模是别种文学样式所难以企及的。科幻作家在创作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了这一优势,我们在阿瑟·克拉克的名著《2001年,宇宙奥德赛》中,便可以找到鲜明的例证。作者把全书分成了跳跃性极大的六个“板块”,其中没有设置传统意义上的能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每个“板块”各有一个立于中心的人物(或机械)。然而,小说中却有一种神秘的矩形物体间断出现,它最早出现在300万年前的非洲,引导了猿人的进化,又在20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在月球的地表下,发出的电子啸叫震昏了前往探查磁异常的弗劳伊德博士,后来又于2001年在亚佩特星上大量出现,变成了把宇航员包曼带往宇宙彼方的通道……这部作品以一种典型的“召唤结构”,诱使读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储存和想象力,去猜想、填补和理解那神秘的矩形物体的真实属性、六段“板块”之间留存的时间空档、人类进化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一系列不确定的意义空白。

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移向科幻小说与现代读者心理联系的更深远处时,将会在幻想这一人类的天性在现代人身上的新发展上找新的契合点。众所周知:幻想在文学中最早的反映是神话。卡·马克思曾对神话有过准确的评价:“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

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然而,古老的神话虽然消失了,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并没有穷尽,对于新的自然力的表现、认识和支配的过程也不会完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对于人类永远是结伴而行的,只不过它所依托的知识不断地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当今的神话就是人们依托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对于新的征服能力的幻想。而这恰恰是与科幻小说的定义甚为符合的。事实上现在有些科幻出版物已被冠上了“科学神话”的字样。正由于科幻小说是人类思维活动在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它何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它的繁荣程度又何以与每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基本一致。

与此相联系,另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也不应忽视,那就是科幻小说有助于人们的内宇宙和外宇宙的平衡。如今,人类已越出了地球的范围,发射的探测器正飞出太阳系,地球上的人已升格为宇宙意义上的人,随着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世界正向人们展示了愈来愈多的新奇性和复杂性,而认识了解周围环境历来是人们获得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科幻小说正是新颖而有效的观察工具之一,它在文学中率先完成了“从人们数千年来习惯于用完全地球中心论描述过程和条件到用宇宙观点看世界的过渡”(A·什科连科语),在互为联系的科学思维观照下,它冲破了种种人为的界限,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现实生活到精神领域,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史前时期到未来世纪,都纳入了自己的艺术反映范围,以巨大的活力和不同寻常的表现力,为人们全面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种种可能和众多的参照系。

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的朝阳正冉冉上升,人类的天地因它的照耀而显得更加宽广、绚丽和令人神往!